

西遊記

上

百家
汇评本

吴承恩 著
吴圣璠 辑评

长江文艺出版社

西遊記
【百家汇评本】（上）

吴承恩 著
吴圣燮 辑评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家汇评本《西游记》/吴承恩著,吴圣燮辑评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5354-3593-4

I.百… II.①吴…②吴… III.西游记—文学评论 IV.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8578 号

策 划:韩 敏

责任编辑:曾 莉 何 海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省安陆市安师彩印厂

开本:787 毫米×1050 毫米 1/16 印张:49 插页:6

版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84 千字 印数:1—7000 套

定价:68.00 元(上、下)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吴圣燮

一、《西游记》是明清神怪小说流派的大囊

被誉为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之一的《西游记》，是明清通俗小说神怪流派最成功的开山之作。自它问世后，继者蜂起，神怪小说流派蔚为大国，与历史演义、侠义英雄、人情小说等汇成了与唐诗、宋词、元曲齐名的明清两代五百年文坛的通俗小说主潮。

然而，《西游记》究竟是一部什么样性质的书，是小说吗？看来，这里还很有必要再加以明确。或说《西游记》是一部小说，是一部神怪小说，或者神话小说，鲁迅则命名为神魔小说，总之，即艺术作品，还容怀疑吗？其实不然。怀疑它是小说即艺术作品者大有人在。不仅过去历史上曾有，就是现今，甚至不难预料到将来，这种分歧还将时隐时现。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百回本《西游记》出现的初期，约明代万历年间，《西游记》是小说，即所谓“东野之语”，“丘里之言”，这一点非常明确。正因为这样，所以士大夫之流看不起，加以歧视、贬斥，小说没有社会地位。这是《西游记》评论史上今存最早的陈元之《刊西游记序》上有着明白记载的。陈元之颇有反潮流精神，他在《序》中严词驳斥了那种轻视和鄙视小说的社会思潮和社会风气。他故意自设反对之词说：“或曰：此东野之语，非君子所志。以为史则非信，以为子则非伦，以言道则近诬，吾为吾子之辱。”然后加以反驳说：“否！否！不然！子以为子之史皆信邪，子之子皆伦邪，子之子史皆中道邪！一有非信非伦，则子史之诬均。诬均则去此书非远，余何从而定之？故以大道观皆非所宜有矣；以天地之大观，何所不有哉。”竟把小说等同于子史，而认为必须共存。这种精神和勇气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为争取通俗小说的合法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声疾呼。不过，有一点应予指出：即不论是反对者歧视者，或欢迎者赞赏者，他们当时都把《西游记》认定为“丘里之言”的稗官、演义即小说却是一致的。

但是，曾几何时，主要是清代，有些人忽然将《西游记》看做是宗教宝典，宣称读了以后能“成佛”、“成仙”、“成圣”，不惜用数万、数十万言，长篇累牍地加以分析和论证，连同《西游记》白文一并翻刻，最著名者有汪懋漪《西游证道书》、陈士斌《西游真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等，一时之间，什么金丹奥旨、佛门心法、《大学》之道，此起彼落，宗

教迷雾笼罩了整个《西游记》论坛。他们居然能将《西游记》逐回、逐段、逐句甚至逐字地与三教教义、炼丹功法并合起来，迷惑了不少人。但有识之士也时有加以批斥和讥嘲，如说“必求得修炼秘诀，则梦中说梦”；当然历史文献中也留下了《西游记》“脍炙人口”、里巷细人乐道之等等的艺术赞誉，反映出当时广大群众不理睬三教之徒那一套奇谈怪论。

直到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新文坛巨子胡适和鲁迅才振聋发聩地从理论上加以批判：“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堪称一举推倒了由三教之徒数百年间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西游记》论的错误体系。

然而，《西游记》其书的确也有它的复杂性。《西游记》成书前，是在民间流传的说唱，早期甚至是在寺庙中向善男信女讲叙。也就是说，《西游记》所描写的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是在漫长时间中以口头文学的形式流传，在流传中发展起来，最后由文人加工改定为长达百回的小说巨著。在这过程中，不仅汇集和容纳了古代中华无数民间艺人和文人作者的智慧和才华；而且可以说最广泛地反映和描绘了中华儿女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和传统文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称誉它为古代中华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巨著，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恰如其分的。因此，在这部《西游记》中，不但道士、和尚和秀才可以看到他们信奉和崇尚的内容；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视野的开拓，多学科视角的探讨，人们必将从中发现更多的方方面面的新东西。这无疑将是《西游记》研究和《西游》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和有力保证。但是，必须紧紧把握一个分寸，注意一条界线，即《西游记》是一部具有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系的小说，是所谓的人学，而决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当然也不是什么实际意义上的哪一门学科的专著，也不是什么宗教经典。不过，总有人真理越出一步，他们对《西游记》中的某些内容有所研究，有所领悟，甚至研究得晕头转向，领悟得着了魔，便以为《西游记》就是形象地表现这些内容的专著。甚至不惜捡起清代和尚、道士和秀才的宗教手册论，不惜将清人平步青早已指出其误的由于《西游记》“所言多与《性命圭旨》相合”，以致断言二书出于同一人之手的说法，竟将《西游记》视为《性命圭旨》的“形象化体现”。出现诸如此类的“新见”，其实不足为怪。今后若有论者提出新见，说什么《西游记》是断头再植学、男性怀孕学、三十三天移民学、克隆学等等亦可理解，因为这些内容《西游记》中都有许许多多生动具体的描写。但只能是从中寻求启示，始终从全书形象体系的分析着手，来认识《西游记》的特性。

《西游记》的出现，与《三国》、《水浒》、《金瓶梅》被誉为明代四大奇书，开创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史的源头，共同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潮流即明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拓了方向。如果说，《三国》、《水浒》和《金瓶梅》为分别开拓历史演义、英雄侠义和社会言情三大流派树立了典范（后来《红楼梦》超越了《金瓶梅》成为社会言情小说流派的代表），那么，《西游记》便是神怪小说的大纛。神怪小说流派成为明清小说中的大国，是《西游记》树立了成功的榜样，提供了最丰富和具有创造性的经验的结果。遗憾的是，

后来几个世纪的神怪小说创作,居然未能出现与《西游记》比美甚至一举超越,像《红楼梦》超越《金瓶梅》那样的作品,但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西游记》思想艺术的高超,它在创作上达到的高度独创性成就。所以,探讨和总结这部小说巨著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其创作经验,始终吸引着历代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兴趣。甚至在清代那些把此书视作宗教教手册的三教之徒笔下,我们也时时可发现高度赞赏其思想深刻和艺术高超的评点。这无疑是他们为小说中生动的形象描绘所吸引时情不自禁的表现,是他们在小说强烈的艺术感应下,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固有的宗教偏见时,出自内心的真实流露。

应该说明的是,《西游记》既然是在近千年的发展中,无数无名作者的共同培育下,最后由文人加工改定;思想艺术是这样高超,形象体系是如此宏大,创作上又具有那样高度的独创性,所以,谁要想一锤定音般全部地正确地加以论述和总结,几乎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相反,却常常出现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截然不同的结论,以致引起反复的热烈的争论,而且有可能在不少问题上出现诸说并存的局面。当然,真理越辩越明;但在众说纷纭情况下,则无疑更需要研究者去深入探讨,读者更饶有趣味地去思索和研考。

举《西游记》主题思想而言,古代评点者最有代表性的见解,就是修心说。从陈元之《序》所引旧叙之称“魔以心生,亦心以摄”,明人谢肇淛《五杂俎》所谓是“求放心之喻”,以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第13回“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一句批“宗旨”二字,莫不都主此说之体现。甚至鲁迅亦以为此书“大旨”,谢肇淛“求放心之喻”的几句话,“很足以说尽”。

随着研究的深入,思想的活跃,今人的《西游记》主题观更是诸说纷呈,各持所见。近年出现的人生说、理想说、哲理说、象征说、自由说、歌颂说、邪正说,都是可从某一特殊视角,启示人们去深入思考和全面把握全书思想倾向和主旨内容的参考。《西游记》以取经僧们西天取经这一事件为依托,充分表现了以孙悟空为中坚的取经集体如何不断克服自身和内部的矛盾,连续战胜具有象征意义的种种妖魔鬼怪和自然界的千难万险,以大无畏的精神勇往直前,终于达到了目的,实现了既定的理想。由此,不但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敢于顽强奋战,又善于艰苦创业,去发展和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而且也以唐僧取经为启示,鼓舞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实现自己的和民族的美好理想,去坚持不懈地努力,顽强英勇地奋斗。

同时,《西游记》这种丰富的深刻的主题启示和思想蕴含,又是以它特有的富有创造性的形象体系的建构和形象画面的表现来完成,因此,作品是显得那样的富有艺术魅力,吸引着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甚至年龄、性别、文化、生活习惯各异的不同层次的人们去欣赏,而又共同赞赏不已。

《西游记》艺术上最成功的表现,大端可从三方面概述:

首先是塑造人物形象的独创性。《西游记》中人物形象的成功度可分几档。最成功的当然是孙悟空和猪八戒。他们足可列身于古代小说人物典型形象画廊中最富创造性的行列而毫无愧色。孙悟空是豪侠形象,猪八戒是诙谐人物。从某种特定角度鉴别,猪八戒比孙悟空更生动,更贴近普通人;其次一档是唐僧、观音、如来、老君和玉皇,宗

教中的头面人物及其地位的崇高性,与他们举手投足、一言一语中透露的俗相和庸气之间形成的形象特性,能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再次一档红孩儿和哪吒,是《西游记》中难得的儿童型神妖类双子座。他们之所以使人印象深刻,外形体态的设计独特与行事动作的稚态盎然的巧妙融合,发挥了极为明显的艺术效果;最后,则要推神、妖中一大批次要人物,诸如镇元仙、牛魔王、罗刹之类,虽属龙套人物,一闪即逝,但闪发出的性格火花,却也能深深吸引着读者欣赏的目光,久久不忘。《西游记》塑造人物形象所提供的经验无疑是相当丰富的,值得人们去深入探讨和反复思索。诸如:一、善于设计并抓住不同人物各种最根本的特征性标志,赋予各个不同的生动个性;二、善于寻求和创造完善体现人物特定性格和特定情景下的完全个性化的生动语言;三、善于让人物在最富有传奇性故事性和往往出乎人们意想之外的情节发展和细节描绘中来熔铸性格,等等。

其次,是创造艺术格调的独特性。《西游记》所创造的艺术上的独特性当然也是无限丰富的。最可推崇的主要是两方面,即爱奇幻和以文为戏。《西游记》之所以能列于四大奇书和成为神怪流派小说的大纛,不妨说,与上述两端大有关联。爱奇幻和以文为戏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很重要的两条艺术经验和艺术传统,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有过反复的论述。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平话《西游记》为标志的取经作品在近千年的发展中,深受这两条艺术经验和艺术传统的培育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读一读上述两种资料,当可一目了然。而发展到百回本《西游记》加工者则又在《西游》作品已有成就基础上,运用、继承和发展这两条优秀艺术经验,达到了圆熟和完满的程度,在艺术创造上堪称出现了新高度。其创造性的最成功最成熟的表现:就以文为戏而言,有意识地避免了为游戏而游戏的倾向,发展了以游戏写意的艺术作风。“游戏之中暗传密谛”,这是明代评点家对《西游记》以文为戏艺术理论归纳,是对《西游记》运用以文为戏、发展以文为戏取得独创性成就的高度评价、由衷赞美和精彩概括。但《西游记》究竟怎样在“游戏”中“暗传密谛”,怎样“暗传”“密谛”,至今犹未认真而全面地加以探讨和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就爱奇幻而言,作者天马行空般驰骋着自己的神思时,并不是单纯追求为幻而幻,为奇而奇;而是作者从改变现状的善良愿望和积极追求出发,对于人类未来生活的某些自由想象,是对于人类未来征服大自然的异想天开的奇妙构思。这就是幻想的特征。《西游记》以富有特征性的游戏笔墨和奇幻手法所创造的宏大而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系中,既体现着圆满而富有色彩的艺术美,也蕴含着深邃而丰富的人生至理和美学理想。

再次是《西游记》所构建的宏大而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系。取经故事的完整性是全书宏大结构的坚实构架,取经故事的发展性则是作品一系列情节内容需要巧妙串联的基础;而全书历来被认为可分三大板块即大闹天宫(约七回)、魂游地府(约五回)和西天取经(约八十八回),以及九九八十一难的构思,则是奠定全书大故事中有小故事,一系列并列的小故事连续不断串连成篇的基本格局。全书艺术形象体系这种架构形式和基本格局的原始基础,无疑由《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平话《西游记》在发展中逐渐固定化;但出现在百回本中的艺术形象体系被发展得如此宏大而完整的基础上,竟又被表

现得如此浑然一体,描绘得那样引人入胜,镂刻得多么优美灵动,这完全是最后加工改定者艺术天才的奇妙创造。这只要将平话《西游记》和百回本《西游记》中有关车迟国斗圣的一段故事加以对比,便可一目了然:平话固然为百回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若没有最后改定者的加工创造为百回本,取经作品最多还停留在《四游记》那样的状态,甚至还可能被淘汰而埋没;百回本的出现,才使取经故事的艺术形象永远被人们所欣赏,世世代代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二、千载演变成奇书 扑朔迷离话版本

《西游记》,准确地说是百回本《西游记》,它问世至今三百余年了;但这部小说巨著并非是谁的个人创作,而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孕育演变了长达千年之久,在民间口头文学基础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反复修改,几度印刷成书,逐步扩大,最后,约在明代万历前期,由文人加工改定为百回本长篇巨著。

但是,由于缺少历史记载和书面资料,我们现在已无法详细描述它是怎样在流传中演变,以及怎样丰富和完整起来的真实过程。唯一可使人们得以欣慰的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因学者的搜求,竟发现了两件宝贵的历史资料:一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为平话《西游记》(片断二则)。它们都是古代艺人口头演出的文字记录,当然也可以说是供艺人口头演出的脚本,或者说是有关该脚本的资料。这就足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问世前,唐僧西天取经故事作为民间文学在人民群众中长期流传的事实;而且它们还像两块里程碑式地勾勒出了从玄奘取经的真人真事,发展到百回本《西游记》那样巨著的演变概貌。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可以代表取经故事和取经作品发展第一阶段的重要标志。《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共上、中、下三卷,分十七节。叙写唐代僧人玄奘(三藏)法师西天取经的故事。取经僧一行七人。除玄奘以外,他人无名。途中又有猴行者加入做护法,他神通广大,无疑是《西游记》小说中猴王孙行者的前身。没有猪八戒和沙和尚。所经之地和所历之险偶有与百回本《西游记》类同。他们经香山寺、蛇子国、狮子林、树人国、大蛇岭等奇方异域;过火类坳,曾遭白虎精袭击;到九龙池,遇九条鼉龙作怪;经滚滚流沙,有深沙神虔心相送;入鬼子母国和女人国,见鬼遇神;又到王母池蟠桃树下,师徒偷桃;再经沉香国、波罗国、优钵罗国,一路瑞气萦绕,景象异常。直到西天鸡足山下,哭求得经文五千四十八卷。程途百万,历时三年。返程时,过盘律国,有定光佛传授《心经》。最后送经回朝,天官降采莲船“乘空”而去。此书无刊刻时间,最迟当刊行于宋元间,在民间演出当更早。《取经诗话》最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神通广大的护法猴行者形象,标志着取经故事已经加进了大量的虚构成分,故事的主人公开始了由玄奘向猴行者的转变。

这部《取经诗话》应该是取经史实演变为民间说唱的文艺作品的历史性记录,是“西游”故事经过长期发展的今存最早的标志和代表作。所以,这部《取经诗话》应该是“西游”故事文艺作品千年间长期演变发展中留存至今的最真实可信的第一块里程碑。胡

适《西游记考证》曾写道：“在南宋时，民间已有一种《唐三藏取经》的小说，完全是神话的，完全脱离玄奘取经的真故事了。这部书确是《西游记》的祖宗。”这一论述，从历史事实出发，以发展的观点和艺术规律性为指导，揭示了《取经诗话》的创作意义和《西游记》小说成书的漫长过程。具体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从《大唐西域记》特别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获取素材和启示，大胆进行艺术虚构和再创造，为唐僧取经故事的艺术化指明了方向，开拓了路子，提供了范例。

加以归纳，《取经诗话》至少从以下四个方面为取经故事的艺术化奠定了基础，对后来的加工改编存在着极其深刻的重大意义。

一是将历史上玄奘取经是为了解经的宗教性动机以及朝廷不许出蕃，玄奘偷越出境的个人行动，加以摒弃和改造，提出了西天取经是“奉唐帝诏敕”，“为东土众生”这样一个具有崇高的思想内涵和目的性的主旨；二是将历史上玄奘在古印度各地漫游中求法取经的头绪纷繁的经历，作了大刀阔斧的删削和改编，统统纳入，简化为“取经”这样一个单一、明确、具体的目标和范围内，使故事主线清晰，全书结构完整；三是将历史上玄奘取经始终以玄奘一人为事实主体，改编为以猴行者作主人公，同往西天者还有小行者五人，从而为改编“西游”作品开拓了人物虚构的广阔道路；四是将历史上玄奘西行求法充满艰难险阻，堪称九死一生的人间历程，改编为一个仙佛鬼怪杂出，似置身于变幻莫测的荒诞离奇的神话中，使全书涂上一层浓厚的神奇怪诞的色彩，为此后“西游”故事作品奠定了艺术基调。此外，至于在具体故事方面，《取经诗话》为《西游记》也提供了不胜枚举的素材，诸如女人国及其国王等系文殊、普贤化身，猴行者偷蟠桃，蟠桃形状像小儿等等，足证《取经诗话》是小说《西游记》演变发展的真实可靠的源头。

《西游记》平话则可以代表取经故事和取经作品发展的第二阶段的又一块里程碑。

平话《西游记》原书未发现，至今只见二则片段。一是编入明初《永乐大典》的《魏徵梦斩泾河龙》，具体标明辑自《西游记》。内容相当于百回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情节和人名几全同；但叙述简扼，文风极似早期话本。二是见于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所叙故事相当于百回本《西游记》第四十四至四十六回的车迟国斗法。一方是孙行者，另一方叫伯眼大仙，其徒叫鹿皮。因行者吃了罗天大醮上祭品，导致双方斗圣。所斗项目有静坐、柜中猜物、滚油洗澡和割头再接；且有行者吃光桃肉让猜桃核和在油锅中装死等细节。情节虽远较百回本中的描绘要简扼，但车迟国斗法的故事构架及其导因和过程均已具体化。二者的衍变和承袭痕迹宛然。这两则平话故事虽未知出于一书抑不同之书，但足证在明初甚至元时，已有内容相当详尽、规模亦甚可观的平话《西游记》在流传。特别是后一片段中尚有多则附注，概括地介绍了该平话《西游记》（又名《唐三藏西游记》）的内容为：西天释伽牟尼佛撰成三藏经，欲送东土度群迷，由观音去长安寻得玄奘去取经；并因花果山水帘洞齐天大圣大闹天官被二郎所执，观音镇压于山下；后由玄奘救出收为徒弟，赐名悟空，号为孙行者，与沙和尚、黑猪精猪八戒同往，遍历师陀国、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棘钩洞、火焰山、薄屎洞、女人国等诸难，降妖伏怪，几死仅免。后取得佛经六百卷，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最后，玄奘证果栴檀佛如来，孙行者证果大

力王菩萨，猪八戒为香华会上净坛使者。如果再将前节魏徵梦斩泾河龙故事并合，则又可知必有唐太宗魂游地府，后来才有设无遮大会，举玄奘为坛主，超度冤魂，然后与观音寻玄奘取经相衔接。由此可知，元时至明初的平话《西游记》，所叙取经故事已是何等完备。

另外，这里有必要说明，除上述现存的诗话和平话材料之外，其它文艺形式反映取经故事的资料尚多。其一，戏曲，规模相当可观。举两例：一是《西游记》杂剧，共六卷二十四出，是相当完整的玄奘取经故事；二是近年发现的队戏传簿，其中所记《西游记》中人物名甚多。但该二则材料确切的年代难考，且它们与平话《西游记》的相互影响等似更难确证。其二，《西游记》平话以后，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以前，多种信息可说明社会上曾有各种《西游记》流传，其中最重要者诸如：一、明盛于斯《休庵影语》曾提及周王府有一部九十九回的《西游记》抄本，而且梓印时增入一回，成百回本；二、陈元之《刊西游记序》曾说：世德堂唐光禄曾购进一部《西游记》，后经订校据之刊印世德堂本《西游记》，该《西游记》肯定有其书，但今未见；三、《西游记》平话以后，很可能曾有《西游记》词话流行，此事曾为《西游》论界反复提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因《西游记》百回本的问世，以其高超而完整的内容和形式，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又加上各地反复刻印，广泛发行，以致使许许多多曾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描写取经故事的作品，几乎陆续湮没殆尽，以致现今难以确考。但即使如此，已经足证：《西游记》是西天取经故事的文艺作品，在近千年的流传中，由小而大，由粗而精，反复修改，千锤百炼，终于成为不朽之巨著。

至于百回本《西游记》的版本史，主要是明清时代的版本史，也显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欲加梳理，似颇显棘手。其中主要是承传关系，不易确断。今将历年阅读和思考所得，简记于后，仅供参照而已。

第一部分：明代刊本四种：

一、《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一般简称世本或世德堂本。卷首《刊西游记序》，题“秣陵陈元之撰”，《序》后题“时壬辰夏端四日”，一般认为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二十卷，以“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一诗为卷目，每卷五回。正文每卷首题“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其中卷九、十、十九、二十则题“金陵荣寿堂梓行”，卷十六题“书林熊云滨重锲”。正文中有夹批八条。此本当为今存百回本《西游记》最早者。据统计，全书实际字数共58万。

二、《唐僧西游记》。笔者所见缺卷一和卷十二，即第一至第五、第五十六至第六十共十回。全书当为二十卷。据有关资料所载，国外尚存同名书，书前有陈元之所撰《序》，则此序本书亦缺佚。据笔者对读判断，《唐僧西游记》系世本删节本。今见全书九十回共42万字，约为世本相应九十回53万字的五分之四，即删节约二成。本书未题梓刻者名。正文中有与世本相同之夹批。

三、《新镌全像西游记传》，一般简称杨闽斋本。“书林杨闽斋梓行”。卷首有《全像西游记序》，亦题“秣陵陈元之撰”，序文与世本大有不同，经将两序对读，系杨闽斋本翻刻世本陈《序》时，将第3叶即5、6两面错简于第4叶即7、8两面之后所致，以致不能通

读。全书二十卷，卷目亦与世本同。各卷卷首亦题“华阳洞天主人校”。本书各卷所题书名和出版者名多有不同。本书亦为世本的删节本，全书实际字数约46万，约世本字数的五分之四；但前半部书删得多，后半部书删得少，有些回未删。删节后多有不可通读处，杨闽斋本删节世本时，以《唐僧西游记》为参照本。正文中有夹批六条，与世本同。

以上三种明刊本因同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向有“华阳洞天主人校本”之称。实际上“华阳洞天主人”所校当为世德堂本，其它两种因系据世德堂本翻刻的删节本，沿用而已。

四、《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白文简称李评本，一百回。不分卷。卷首有《题词》，后署“幔亭过客”，有墨章二：一为“字令昭”，一为“白宾”，据之可知《序》作者为袁于令。《序》后有“凡例”五条，为“批着眼处”、“批猴处”、“批趣处”、“总评处”、“碎碎处”。卷首附图百叶，前后两面写一回事，共图二百幅。正文有眉批，又有回后总批。世德堂本八条夹批为本书全部沿用；但李评本实为百回本《西游记》系统评点之先声。台北天一公司曾发行影印本。

中州书画社据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河南省图书馆所藏，曾影印李评本一种行世。卷首题词和正文缺字，曾作补正。卷首无《凡例》。图插每回正文之前，图有缺。正文中有行间夹批，与上述台北天一版影印本大都相同。只极少数此有彼无或彼有此无，总批亦略少于上述版本。

第二部分：清代刊本六种：

一、《西游证道书》，白文简称证道书本或证道本，一百回。目录页首题“新鐫出像古本西游证道书”，第二、三行题“钟山黄太鸿笑苍子、西陵汪象旭檐漪子同笺评”；正文卷首题目、“佛像古本西游证道书”，第二、第三行分别题“西陵残梦道人汪檐漪笺评”、“钟山半非居士黄笑苍印正”。卷首有《原序》，序后题“天历己巳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又有《丘长春真君传》等文。正文有行中双行夹批和回前评。回前评标有“檐漪子曰”，分段前标“又曰”。本书以李评本为底本，参照世本删节而成，全书39万余字。证道本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即论界所称唐僧出身故事，为明刊百回本所无，汪氏自称系据古本大略堂释厄传（或大略堂西游），实据明版简本《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卷四改编。正文第十、十一、十二等三回则与明刊本第九至第十二等四回内容相应，回目有改动，文字均作删节。本书刊刻于清康熙二年（1663）。

又有清文盛堂刊本。内封题“西陵檐漪子笺注，秣陵蔡元放重订”，正文前题：“西陵檐漪道人汪象旭原评”，“金陵野云主人蔡宙憨评”。卷首有《增评证道奇书序》，后题“乾隆十五年岁次庚午”；次为《读法》，共五十六则。

二、《西游真诠》，白文简称真诠本，一百回。康熙三十五年（1696）初刻。首有自序、尤侗《序》。为悟一子陈士斌诠评本。本书以证道本为底本，并参考李评本删节改写，全书40万字，较证道本略多。其中诗歌较证道本多约40首。真诠本为清代继证道本后又一部佼佼者，为清代最为流行的《西游记》版本之一。真诠本的翻刻本极多。每回有回后评，首有“悟一子曰”，评语多有长达千言以上者。《西游真诠》在清代《西游记》版本演变中影响甚大。

三、《新说西游记》，白文简称新说本，一百回。初刻于清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首有张书绅“戊辰年秋七月”《西游记总论》，又有《新说西游记自序》和《新说西游记总批》长文。新说本为明前《西游记》版本之最长者，不妨称之为超全本。主要以李评本为底本，并参考了世本；同时，又以真诠本为底本，吸纳该本第九回唐僧出身故事。另外以真诠本第十回至第十二回回目及其正文起点处为根据，将李评本第九回至第十二回等四回合并后，再分割为三回。所以，新说本不但吸纳了明版全本文字，又增入了清版第九回唐僧出身故事。每回有回前评、回后评，又有大量行中夹批和行间夹批。《新说西游记》与《西游真诠》同为清代最流行的《西游记》本子，曾有多种翻刻本印行。其中最流行的当推味潜斋石印本《新说西游记图像》。该版本新增光绪十四年(1888)王韬《新说西游记图像序》；又：书前有人物画像二十幅，正文每四回前各有图四幅，各绘该回故事，图极精致，图上题该回回目；又，该书缺第三十一、三十二两回正文和批语，只以《西游真诠》本相同两回正文和回后悟一子长评补入；但正文行中新加了夹批，批者佚名。

此后，又曾先后印行《西游原旨》(刘一明)、《通易西游正旨》(张含章)和《西游记评注》(含晶子)。文本均沿用真诠本，甚至有未作任何增删改进者；而评批亦成真诠本余绪，竟无新意。

这里尚可一提者，清末还有一部抄本《西游记记》，著者怀明。该书《西游记》文本既非全本，亦非节本或简本，而是自成另格。著者将《西游记》分成若干组，每组一至数回不等，共39组；全书无总目，每组前先标明第几回、第几回，接着标明这几回的回目，然后逐回摘叙正文。文本极简扼，如第六回叙猴王与二郎斗法，原文极精彩，此本删节改写成约近二千字，只有清代简本真诠本等的一半。相反，批语却极繁富。于每回正文前有长篇韵语批文，文中又时有双行夹批；而且正文中又时有双行夹批和单行行间批；又偶见眉批。以《易》道批《西游》，批语间卦爻图像杂出；下半部多以韵文为批，并注出小令曲名。

以上历叙《西游记》成书史和今见明清两代《西游记》版本演变，虽简扼，而且亦未涉及论坛长期来所争论之《西游记》佚本、简本等内容；但从中已大体可见围绕《西游记》所引出的错综复杂的情况。

三、吴承恩和《西游记》作者之“谜”

时至今日，《西游记》这部煌煌巨著，古今来都誉为四大奇书之一的古典通俗小说，不但已经流行全世界，而且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不过，提到它的作者是谁的问题，却依然争论不休。虽然在不同年代，有论者都曾对某氏为《西游记》作者似言之凿凿，颇为论界赞同，但一个时期以后，却又有人提出不同见解，甚至又被彻底否定。这样一来，《西游记》作者问题，不妨说，堪称是一个复杂的老问题，难解的“谜”。之所以形成这个难解的“谜”，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当然，也有学术方面的原因。错综复杂，若要彻底解决，难度似乎依然存在。

根据前文所述百回本《西游记》成书史和版本史，与作者问题有关者，这里可以先

确定几点：一是《西游记》决不是哪一个天才作家的个人创作。它以唐代高僧玄奘古印度取经这一宗教徒著名长征的历史故事为题材，经过近千年间无数说书艺人和下层文人的反复修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口头演出到印刷成书发行，发展到明代万历年，才由文人最后改定为百回本；二是《西游记》百回本成书以后，由于它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于是续有文人和书商出于各种目的，对它作了增删修改，评批校释，甚至改头换脸，出版发行。《西游记》版本史上这类本子，则大多具有著者实为删节改编评点者之名。所谓《西游记》作者之“谜”，从原则上说，当然既不是指《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或《西游记》平话的作者是谁，也不是指清版《西游真诠》作者陈士斌或《新说西游记》作者张书绅等等，对他们的研究虽也重要和有意义，甚至其中同样有它们之难解之谜，但那是题外之话。所谓《西游记》作者之“谜”，集中到一点，就是改编成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当然，如果这位作者在改编前后密切相关到另外什么人，那么此人也必然是“谜”中一员。

但是，今见的历史资料，并没有具体记载，却反而增添了不少疑团和复杂性。《西游记》作者之“谜”，是与《西游记》百回本与生俱来的。前文提及的陈元之《刊西游记序》说：

《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而无叙于余。

陈《序》当然是《西游记》成书史和版本史上最珍贵最可信的历史资料，它所提供的有关信息，涉及的内容广泛，问题重大，是今见的其它历史资料所不能代替和不能企及的。陈《序》与《西游记》作者问题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有如下方面：一是世本是据唐光禄所购进而“奇之”的那部《西游》（姑称之为前世本）为底本而刊刻的；二是前世本作者为谁，看来陈元之也不知道，但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即三个“或曰”，无疑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说法，即藩王府中人；三是如果世本与前世本全同，那么他的作者当然也就是藩王府中的那人，问题是二者并不相同，世本是经“好事者”“订校”和“秩其卷目”后刻成的，此“好事者”之名，《序》中未说，但读世本各卷卷首所题“华阳洞天主人校”，应是指他；四是由上可以推定：通常所谓《西游记》作者，实际上应该是指“前世本”作者，这对于《西游记》爱好者特别是研究者是必须明确的。

说到底，陈《序》虽然提供了许多有关《西游记》百回本问世前后的珍贵历史资料；但大多语焉不详。而且，论界虽历来认为百回本《西游记》问世后，其它在社会上流行的多种有关西游故事的版本先后湮没；但先后湮没不会在一夜之间，实际上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从现有资料来看，包括世本在内的三种华阳洞天主人校本《西游记》当时也并不怎样广泛流行，相反，据今见的一些历史资料来看，还有一种九十九回本、或目录不同的百回本等曾为人们所收藏或所读过。一直到明末，李评本的出现，大概

又给人们耳目一新之感,所以反复刊行,流行一时。甚至衍生出采李评本一部分批语,融入杨闽斋本附图或白文,再将该本加以校订的《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由建阳“闽斋堂杨居谦校梓”,简称“闽斋堂本”,以有别于杨闽斋本。而《西游记》作者的问题,相反,却被搁置了起来,少有人再过问。

所以,所谓《西游记》作者之“谜”,实际上是从百回本问世时的源头时期就与生俱来了。这是时代的局限所造成,有它深刻的社会和历史的根源;具体说,因为《西游记》是“丘里之言”,通俗小说,没有任何社会地位;而只能遭封建统治者和习惯势力所鄙弃,甚至镇压,所以作者几乎都不愿公开具名。这也不只是一部《西游记》如此,当时许多通俗小说几乎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作者是谁。

曾几何时,到了清代康熙初年,忽然犹似峰回路转,有人言之凿凿地提出:《西游记》的作者是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的邱(原作丘,避讳作邱)处机。见汪懋漪《西游证道书》。如前所述,该书虞集所撰《原序》中说得明明白白:虞集所见的邱长春所纂《西游记》上的内容是“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不仅如此,与此相“配套”,汪懋漪在《西游证道书》中紧接《原序》又编进一篇自撰之《丘长春真君传》,题下注明:“出《广列仙传》及《道书全集》。《传》中说:邱处机“有《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行于世”。有清一代除个别学者曾表质疑以外,莫不同声附和。但是,弄虚作假只能瞒人于一时。原来邱处机生卒年为公元1148—1227,约生活在南宋时期北方的金国和蒙古,他怎能撰著出现于明代万历间的百回本《西游记》?再说所谓虞集撰《原序》,其实也是一场骗局,因为“天历己巳”年间(1328—1329)所见只能是平话《西游记》(或所谓词话《西游记》)之类,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西游记》百回本,说到底,那个时代,连长篇通俗小说史的源头也未到来,怎可能会出现“数十万言”的《西游记》?不过,若加细究,邱处机的确与一部《西游记》有关。原来邱处机于公元1220年应元太祖之召与弟子李志常等远适西域,受封神仙,掌管天下道教。根据这次西行经历,李志常于公元1228年撰写《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约数万言,记其沿途所见所闻,师徒问答,以及途中吟咏之什。此书在道门中影响不小,到明代竟被编入《道藏》。此《西游》不是那《西游》,本是明白无误的;但后来的确把此《西游》误会成那《西游》了。原来元末明初人陶宗仪撰《辍耕录》有《长春真人》一节,记叙了邱处机的生平,文后有“已上见《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等书”一语,所指是文中记载的事迹来源,见以上各书。其实上述书中,前二者虽邱处机所作,后三部却另有作者,其中《西游记》的作者即李志常。此《西游记》就是《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简称,这是当时人的习惯,如樗栎道人秦志安编《金莲正宗记》,于《长春丘真人》一节记叙邱处机生平,有如下语:“所有诗歌杂说,书简论议,直言语录,曰:《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近数千首,见行于世。”所说《西游记》,无疑也是指《长春真人西游记》。此书虽非邱处机所作,但如前所说书中记录了邱处机不少的“诗歌杂说”。以上所记当然都是事实。但到汪懋漪所编写的《丘长春真君传》中的《西游记》,虽未说明内容是唐僧西天取经;但与此《传》相呼应的虞集《原序》中,却明明白白记叙着他所见的“数十万言”的邱处机所撰《西游记》“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如此一来,《西游记》邱作说终于盛行一时。但是,应该说,时至今日,《西游记》邱作说之

妄,已经成定局,决无改变之可能。

不过,由于情况的复杂性,甚或出于宗教偏见,甚或由于理解片面,还时闻有人张扬《西游记》邱作说或改头换脸的邱作说,诸如有论者认为《西游记》作者非道家莫属,最后竟认定是明初洪武、永乐时代的被封真人的某某著名道士,则不免成为笑谈了。因为一部著名小说的完成或刊刻,与该书作者所生活的时代,是决不可能相距遥远的。但是,《西游记》邱作说或由此延伸的相关各说之所以失误甚至失误到无可挽回或没有讨论的余地,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脱离和违背了陈元之《刊西游记序》所记载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则。

《西游记》吴承恩著之说,虽迭经争论和批评,甚至有论者言之凿凿地提出:吴著说非否定不可;但至今似乎不但未被批倒,反而似理由更为充足。究其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此说有陈《序》作依托,而且有越来越与陈《序》所叙相吻合之趋势。虽然,《西游记》吴著说并未成定论,也不可能如此简单地成定论,但它的趋势和性质,无疑与邱作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是可以肯定的。

最早提出《西游记》吴著说的是清代学者吴玉搢和阮葵生等,主要据淮安《志》载吴承恩著杂记数种和文目中有《西游记》,但因信旧说为邱处机作,故均游移其词;又或以以为吴承恩据邱著演而为通俗演义。后有平步青撰《霞外摭屑》,其中卷九《小栖霞说稗·西游记》一节,力辩各家说法之异同:一是引钱大昕《潜研堂文集·跋长春真人西游记》云,“《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邱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二是:“予按《茶余客话》,《西游记》乃山阳吴承恩所撰。《灵芬馆诗话续》(卷三)引吴山夫《山阳耆旧传》云:‘吴汝忠,名承恩,《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所著。’观其中方言俚语,皆吾郡委巷中所习闻,而他方有不尽然者,其出淮人手无疑。”三是“桂氏馥《晚学集》(卷五)《书圣教序后自跋》云:‘许白云《西游记》由此而作。’当别是一书。”四是:“若陈文述《西泠仙咏自序》,谓‘《邱祖西游记》只二卷,载在《道藏》……世传《西游记》则邱祖门下史真人弟子所为,所言多与《性命圭旨》相合,或即作《圭旨》之史真人,弟子从而演其说也。’亦略本竹汀。特以演义为史真人弟子作,不云吴承恩,则云伯晚事修炼,过信黄冠,从而为之辞。”

以上清人所述,观点甚为明确:一是把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误会成邱处机撰小说《西游记》,系郢书燕说;二是说明所谓许白云撰《西游记》为另外一书;三是讥刺有人由于“过信黄冠”,所以竟说小说《西游记》虽不是邱处机所撰,却是《性命圭旨》作者史真人的弟子所作,原因是《西游记》所言多与《性命圭旨》相同;同时,在指出以上种种失误后,提出《西游记》作者系淮安(山阳)吴承恩。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学者所发表的《西游记》作者论,大致都是个人心得的记录,或者是文人间相互交流,其传播的速度和影响,与邱作说流传年代之久和范围之广根本不能比拟,且后者主要借《西游记》作品本身的发行来实现。所以,《西游记》吴著说虽在清代后期就已提出,却并未被社会所承认和读者所认同;但是,却为之后的《西游记》作者研究,积淀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同时,更重要的是为稍后一举推倒统治稗坛数百年的《西游记》

邱作说,准备了系统的翔实的无懈可击也堪说无可争论的根据。

及至二十世纪初叶,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及其在民众中广泛深刻的影响,《西游记》等明清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完全改变,一跃而成为国民新文化和新文学教育内容的重要部分。鲁迅和胡适不但分别将包括《西游记》在内的一系列明清小说名著,作了深入的研究,细致的考证,不仅撰文发表,而且作为高等学府讲课内容和教材,还作为序言与该小说文本同时发行。稍后又有孙楷第、郑振铎等学者,相继从事通俗小说和《西游记》的系统研究。特别是孙楷第在全面访书的基础上撰著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具体编著了明清两代出版的《西游记》版本目录,并对《西游记》承传演变中出现的一系列疑难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概述;而郑振铎又以孙楷第《书目》为参考,目验了多种明清《西游记》重要版本后,撰成了《〈西游记〉的演化》这一系统论述《西游记》版本承传演变中重要问题的专文。运用新思想新方法全面研究《西游记》的成果之一,就是有关《西游记》的承传和作者问题的新突破。承传问题新突破的标志就是《西游记》有所谓“祖本”,即《西游记》是以另一种记叙唐僧取经的作品为底本改编而成,如鲁迅提出是杨志和所编《西游记传》;而作者问题新突破的标志就是《西游记》作者不是邱处机而是吴承恩。此二者当然不可能完全割裂,而将其结合起来加以综合思考和研究的结果,一个崭新的命题破天荒第一次在《西游记》研究史上出现:

吴承恩之为罗贯中、冯犹龙一流的人物,殆无可疑。吴氏的《西游记》,其非《红楼梦》、《金瓶梅》,而只不过是《三国志演义》和《新列国志》,也是无可疑的事实,惟那么古拙的《西游记》(这里是指《永乐大典》辑的《西游记》残文《魏徵梦斩泾河龙》为代表的平话:吴),被吴承恩改造得那么神骏丰腴,逸趣横生……

陈元之的序道:旧有序。……假如所谓“旧序”,确是吴氏所自为,则陈氏所称“此其书直寓言者哉”,或很可信……

《西游记》之能成为今本的式样,吴氏确是一位“造物主”。

上引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中这段话的理论意义和启示意义,也许我们至今尚未加以充分发掘和分析,相反倒反而着眼于具体的个别的论题的正确性如何等等浅层的探讨和争论。当然,后者的研究也完全需要;但是,前者更具有理论指导性。例如,关于《西游记》的作者究竟是谁?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吗?这样的问题在读者中的关心度是很大的,然而若要像做是非题或填空题般作出简单的回答,则必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倒反而引出诸多不得要领的无休止的反复争论。看来,郑振铎理会和把握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论述中把诸多相关的问题能够联系起来或对照起来分析和理解,从而使之深化和全面,得出正确的答案,使读者从中不断获得启示。如郑振铎在文中曾一再引用陈元之《序》的文字,把内容串连起来观察、分析和论述:例一,引陈《序》中“旧有序”一段后称,“假如所谓‘旧序’”,确是吴氏所自为,则陈氏所称‘此其书直寓言者哉’,或很可信。作者殆是以古本《西游记》为骨架,而用他自己(或他那一个时代)的混

淆佛道的思想,讽刺幽默的态度,为其肉与血,灵与魂的了。”又如例二:引陈《序》中关于作者问题的三个“或曰”一节后,论道:“彼时,似不知此书出于吴承恩手。惟既有‘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语,则吴氏或尝为‘八公之徒’欤?嘉、隆间的文人们,出入于藩王之府,而为他们著书立说者不少概见。吴氏殆亦其一人”!

以上两段文字中,可以非常鲜明而突出地体会到论者之所以能推断出创新之宏论的根本原因: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全面分析。没有这两条,郑振铎怎会自找麻烦地将吴承恩与陈《序》联系起来,竟写下“吴氏或尝为‘八公之徒’欤”和“假如所谓‘旧序’,确是吴氏所自为”这两个他根本无法回答甚而大为不利的命题;甚至相反,大可采取视而不见,加以回避,以利天马行空般驰骋自己的宏论。事实上,在上世纪学界推出《西游记》吴承恩著说时,就有学者据陈《序》三个“或曰”反驳道:吴承恩与藩王府无关,怎么可能是《西游记》作者!但是后来的事实终于证明吴承恩曾任“荆府纪善”,他的确堪称为“八公之徒”,与藩王府有关,郑振铎的推测竟成为预言。至于吴承恩是否《西游记》(应是前世本)的“旧序”作者,至今无史料,今后也未必有史料证明。说到底,这与“前世本”作者是否吴承恩并无根本关联,因为一部书的《序》,既可由原书作者所撰,也可由旁人执笔。问题是郑振铎在论述《西游记》作者问题时,主动地有意识地将此题与陈《序》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的做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郑振铎力创新说是为了推进学术研究,所以能无所顾忌地分析有关资料,对己有利的不夸大其词,故意绝对化,对己不利的也敢于坦然直陈,供人分析。如论坛坚持由此前进,所谓《西游记》作者之“谜”,是不可能似乎越来越难解;恰恰相反倒有可能最终不成其为“谜”!

时至今日,以陈元之《序》作根据,加以全面分析,当以如下说法最为妥帖:华阳洞天主人是世德堂本即世本的最后订校者;华氏订校时作为底本的是唐光禄购进而“奇之”的那部《西游》(姑称“前世本”),“前世本”的作者应是曾任“荆府纪善”的“八公之徒”山阳(淮安)吴承恩;但是吴承恩也不是个人创作,而是在一部同样名为“西游记”的口头文学作品平话(或词话)作底本加工改编而成。

四、关于本书若干情况的必要说明

1. 本书以金陵世德堂梓《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即世本为底本。选世本为底本的原因,最主要的它是今见的所有明清百回本《西游记》中的最早问世者。虽然有论者曾提出过:今见的世本卷九、卷十、卷十九、卷二十另题“金陵荣寿堂梓行”,卷十六题“书林熊云滨重镌”,因而“可能是三种刻本的拼凑”。其实,即使是三种版本的“拼凑”,今见世本也依然是百回本《西游记》最早问世者,因为至今并未见比它更前者。再者,这之前世德堂是否刊刻过另一种完整的《西游记》无考,所以亦曾有论者认为今见的拼凑起来的世本,是由于某种变故造成,其实是最早的刊刻者。又,以往亦有论者提出过:杨闽斋本可能比世本问世要早,主要理由是世本陈《序》题刊刻于“壬辰”,一般均从孙楷第所考以为指万历二十年即1592年,而杨闽斋本陈《序》所题的年代是“癸卯”,则以为为是万历三十一年即1602年;但也有可能杨闽斋本题的“癸卯”不是万历年间的“癸